

王群著

几位当代文化名人



琅琊台和茂腔戏



几位当代文化名人与 琅琊台和茂腔戏

王群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几位当代文化名人与琅琊台和茂腔戏 / 王群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80737-469-5

I. 几… II. 王… III. ①文化—名人一生平事迹—中国②名胜古迹—保护—胶南市③茂腔—发展—研究. IV.

K825.4 K928.705.24 J825.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0058号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青岛任缘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140×210mm

印 张：4.625

定 价：42.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山东省胶南市，古时称琅琊。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天下，全国设36郡，琅琊郡都建于现在的胶南市所辖地域。古代文献中把琅琊比为美玉。就是这玉一样美轮美奂的滨海胜境，不仅吸引众多帝王前来巡游，而且也令历代文人学者向往，许多人把来琅琊领略壮丽的山海风光和感受独具特色的文化看做美好宿愿的实现。汉代的司马迁，南北朝的谢眺，唐代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宋代的苏轼，清代的丁耀亢等文学大家所留下的写琅琊的大量诗文，不仅是琅琊地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珠玑，而且也是全国文苑中传世久远的名篇佳作。到了当代，更有文化艺术界的名家纷至沓来。作者在本书所记述的是他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王朝闻、徐逸樵、王宏钧、史树青、朱丹南、刘炽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关心历史文化名胜琅琊台和地方戏茂腔，以及他们来胶南考察研究的情况。作者还收集了与此有关的著述，作为附录，一并编入书中，留住了琅琊文脉传承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这段历史印痕。



“四十年来的宿愿实现了！”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登上琅琊台，在这里倾听历史。

1981年7月，
王朝闻在青岛永安
大戏院观看胶南县
茂腔剧团演出，刚
走出剧院就兴致勃
勃地与本书作者交
谈起来。



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王宏钧（左三）与王群（右三）、王景东（右二）研究复制琅琊刻石事宜，并对《琅琊台图》鉴定评价。



1981年7月，朱丹南（左一）在青岛八大关与王培信（左二）、王群（右二）及胶南茂腔剧团几位负责同志座谈戏剧创作。



1981年7月4日上午，王朝闻（左三）、朱丹南（左四）、刘炽（右四）在青岛永安大戏院畅谈茂腔戏。



1981年6月下旬，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观看胶南县茂腔剧团演出与演员见面。



1981年7月4日上午，王朝闻（前排右四）、朱丹南（前排右五）、刘炽（前排左四）与参加胶南县茂腔剧团演出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目 录

- 1 名家与琅琊台相会
29 “三老”倾情茂腔戏
53 《琅琊刻石》拓片等三件民间藏品面世始末
59 胶南在茂腔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

附录：

- 66 汇泉湾与琅琊台 王朝闻
69 溯源两千年
——徐福一行入海行踪考 徐逸樵
86 明代颜悦道《登琅琊述》碑碑文
90 从肘鼓子到茂腔 王培信（执笔）
庄金墀 毕宏川
傅桂馨 王 群



111 茂腔音乐谱例

- | | |
|----------------|------------|
| 113 噢号汉 | 《穷吵年》选段 |
| 114 捏线 | (茂腔曲牌) |
| 114 播簸子 | (茂腔曲牌) |
| 115 四不像 | 《三宝山》选段 |
| 116 正调二板 | 《王定保借当》选段 |
| 117 正调女腔快四平 | 《王定保借当》选段 |
| 118 正调女腔慢四平 | 《王定保借当》选段 |
| 120 正调男腔四平 | 《罗衫记》选段 |
| 121 男腔反调 | 《罗衫记》选段 |
| 122 正调女腔大慢板 | 《杜十娘》选段 |
| 124 反调女腔导板 慢原板 | 《梁山伯祝英台》选段 |
| 126 摆板 | 《血涤鸳鸯》选段 |



千古名胜琅琊台

名家与琅琊台相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琅琊台，已是一个国家“AAA”级景区。到此一游的人们，大都交口称赞，留连忘返。可是过去的琅琊台，却是另一番模样。琅琊台从一片荒凉、游人罕至到生气勃勃、靓丽诱人的变化，掐指算来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路程。当年参与其中工作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了“小老头儿”；那些关心琅琊台，为琅琊台的保护、建设和开发倾注心血的专家学者们，多已是耄耋之年，有的作了古人。回想这一过程之初，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鲜为人知。

1978年9月，奉命调文化局工作时，我还在胶南县委整党队（张家楼公社整党大队副大队长），1979年初，才回县接手工作。当时的文化局只有一间房子，一部电话，三个干部，三张桌子，物质条件很差；又加上自己初涉文化工作，一切从零开始，确实困难不小。但是一旦到岗，就是一种责任。上级布置任务，下属单位请示工作，都迫使自己不得不从头熟悉文化工作，深入研究文化工作，按照文化工作的客观规律扎扎实实地办好每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琅琊台问题提上议程之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胶南，包括琅琊台在内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没有专门的机构去做，只靠图书馆（前为文化馆）内的一位文物干部（当时是王景东）唱“独角戏”，终年忙累，见效缓慢。但是，我看到王景东同志那种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可贵的精神状态，也增强了信心。甘愿和大家一起，在现有困难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力把工作做好，起码让自己问心无愧。

征集相关文物，考证历史遗迹，是研究琅琊台未来开发建设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自然也就是我们初期工作的着力点。为了摸清情况，掌握文物工作底子，我和王景东同志一起，穿着“解放鞋”，骑着自行车，跑了不少古遗址、古墓群和相关文物保护单位，从中加深了对胶南悠久历史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对研究、宣传琅琊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之俱来的更是一种压力和责任，自然也就衍生出“扮靓”琅琊台的一连串梦想，并努力逐一变为现实。

——责任义不容辞，全靠“众人拾柴”。对于琅琊台，我年轻时就有印象：1966年春在驻琅琊社教工作大队时，曾跟随县委的领导同志与300多名工作队员一起，登台植树3天。当年的幼苗如今已经成林。那时对历史了解甚少，不知此台真谛，只觉得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山。

近20年后自己干了文化工作，带着任务再次登台，依旧是那种荒凉之感。特别是在1980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这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题目是《琅琊台

被毁令人痛惜》。信中说：“山东胶南琅琊台，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3次登临的遗址，现在几乎荡然无存。山顶的望日亭坍塌颓败，雕龙琢凤的庙石被用来砌了厕所”；“在当年无数民工从山下运土为秦始皇观海而筑的土台上已修房盖屋，约半米见方的秦代方砖和瓷瓦到处弃置，令人十分痛惜。”见到这一来信后，我和王景东、刘圣文同志（当时的琅琊公社文化站站长）都去现场看过，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二是，6月份我去青岛开会，一位领导同志让我给胶南县委传信，建议当地政府写报告层报北京，将胶南县改名为“琅琊县”，并讲了改名的理由，详谈了“琅琊”的历史地位和对外影响。这件事使我进一步领悟了琅琊台问题的重要意义，亲见了上层人物对古琅琊的关注程度。虽然因客观情况所限，没有更改县名，但对县内各级领导重视和加深认识琅琊台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耳闻目睹的许多现实情况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殷切期望，我暗下决心：一定按组织分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沉睡多年的琅琊台重新焕发生机，让千古一帝秦始皇登临之地再显风采。这是一件利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大事，靠谁去完成？那自然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全县群众，特别是各级文化干部，形成共识，群策群力，“众人拾柴，添火助焰”。在一次全县文化干部会议上，文化局庄金墀局长号召大家要在做好各自本职工作的同时，把宣传琅琊台和征集相关文物，作为全体同志的共同责任。他还亲自带领我们多次找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情况，并利用有关会议和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由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参与其中，不少农村百姓献出了家藏的与琅琊台相关的文物，有的提供了历史资料线索，各公社文化站长更是



首当其冲，文物专职干部也自然要加倍忙碌了。

——刘圣文忙中有乐，琅琊台连连“献宝”。圣文同志是琅琊公社文化站站长，又生长在琅琊台下，其使命感不言而喻。由于他的热情宣传、积极工作，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争相“献宝”，因此相继比较集中地在琅琊台及其周围，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68枚完整的齐国刀币、战国时代的夹砂灰陶（输水）套管、秦代“千秋万岁”瓦当、汉代双系釉陶壶、明代沉船及瓷器（哑岛海域）、《琅琊刻石》拓片、《登琅琊述》（明代）石碑拓片和《琅琊台图》等等。

有了这些重要文物的连连发现，可忙坏了刘圣文。他不仅亲到现场勘查保护，还要及时报告，请人鉴定；更使他为难的是求人借车，妥善运送文物到县城。只要能把事情办好，刘圣文怎么做都不烦。他忙中有乐，有时顺利完成任务后还高兴地唱上几句，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呀！

——王景东跟踪考古，毕长增译文解字。每当接到刘圣文发现琅琊文物的报告，王景东同志便应声而到，坐公共车、骑自行车都行，从不误事，从而确保所有征得的文物在最短时间内入馆和送上级鉴定，无一遗失损伤。琅琊文物，进一步把王景东和刘圣文联结成“一对好搭档，两个好朋友”。毕长增同志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不是文物工作者，但他既爱好鉴古，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文字水平，更具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每当遇到古碑碣、古字画等难懂的文字，我都愿意与长增同志探讨切磋，请他译文解字。他有一股韧劲，面对这些“份外”工作，总是不辞辛劳，锲而不舍。他除了翻阅大量史籍辞书，还虚心请教别人，不轻易放过一字一划，力求译文准确，通俗易懂。不少译文得到专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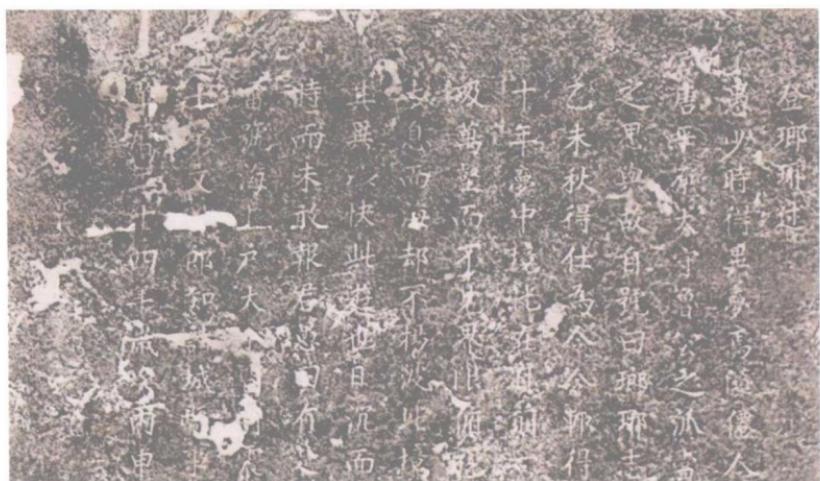


民国年间王和沛绘的《琅琊台图》

纪中良 摄影



秦琅琊刻石拓片



明万历二十四年诸城知县颜悦道在琅琊台立的《登琅琊述》碑拓片（局部）



的肯定和赞扬。明代颜悦道《登琅琊述》石碑拓片，原拓有残缺且保存年久，比较难译。当我请长增同志帮忙时，他欣然接受。先后几次译了再考，考了又译，最终整理出了一份表意贴切、文字流畅的现代汉语译文。

——三人小组有备进京，为琅琊台拜访专家。经过上述较长时间的努力工作，重塑琅琊台形象的工程，已经有了一些“家底”。但要想真正把事情办好，还必须有专家们的智力支撑和舆论支持。因此我们决定进北京拜访相关专家学者，请名人大家们“与胶南同行”，为琅琊台“扮妆”。就此专题，庄金墀局长主持召开了办公会，充分研究了进京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初步商定由我和战清连（当时的琅琊公社党委书记）、王景东、王培信、刘圣文五人赴京，共同完成这一任务。后因战清连、刘圣文同志另有公务，不能同去，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所以庄局长风趣地说：那就叫三人小组吧！

此次进京，我们的主要任务有四项：

一是，将刘圣文同志发现、征集的三件民间珍藏品（《琅琊刻石》拓片、《登琅琊述》石碑拓片、《琅琊台图》），送请专家鉴定评价。

二是，汇报修复琅琊台和建立胶南县博物馆两项工作意见，请求经费支持。

三是，请求为胶南加工制作琅琊刻石复制品，以藏于县博物馆或立于琅琊台上。

四是，送审《茂腔发展概况》专稿（另文专述）。

根据这些任务，我和王景东、王培信三人临行前详细勾画了进京后的活动方案，想尽千方百计力求顺利完成任务。各项准备



工作就绪后，我们的“三人小组”肩负着胶南人民和各级领导的重托，于1982年9月19日晚，乘青岛—北京的204次特快列车，进京“办大事”去了。

为办好琅琊台事 名家热诚拳拳

时过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翻开《胶南县志》和《琅琊台志》的“大事记”，一件件大事清晰可见，各级领导和国际友人登临台上，都记载周详。看到这些，的确有一种琅琊台“活”起来了的感觉，从心眼儿里高兴，因为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结果。然而没有载入“大事记”的还有许多幕后英雄，特别是那些与我们同绘琅琊台蓝图的当代文化名人。他们身居京都，工作繁忙却关心胶南，不忘琅琊台；他们为“装扮”琅琊台倾心献策、有求必应的故事感人至深。今天回想起与他们短暂相处的时光，觉得很幸福，很难忘，仿佛这些受人敬重的前辈和德高望重的学者，此刻就在面前。

史树青 有求必应

1982年9月20日，我们三人到了北京。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距前门不远的解放军总后一所。进京后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拜访史树青先生，请他为我们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史先生是一位人所共知的“有求必应”热心人，对为考古和文物鉴定找到他的人，他都迎为上宾，周到安排，协助到底。

史树青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咨议委员